

跨国公司积极备展进博会

本报记者 袁勇 朱琳

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今年11月5日至10日在上海如期举行。随着会期临近,众多企业报名签约,参展商也开始积极备展,以便向世界展示和介绍其创新产品和技术。

据悉,第五届进博会企业展将设置六大展区,即食品及农产品、汽车、技术装备、消费品、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服务贸易展区。截至7月27日,签约面积约占规划面积的85%。在签约参展企业中,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超270家,“回头率”近90%。

进博会举办至今,国际采购、投资促进、人文交流、开放合作“四大平台”功能日益显著,获得了参展商的普遍认可。连续参展并持续丰富参展内容,成为众多参展商的首选。

今年,3M将连续第5年亮相进博会,并将入驻技术装备展区的“能源低碳及环保技术”专区,以“科技赋能未来”为主题,从“科技赋能循环经济”“科技赋能气候”“科技赋能社区”三大角度诠释“科技改善生活”的品牌理念。此外,3M将展出多项在中国市场首发或首秀的前沿创新产品和低碳解决方案。

贺利氏也将第五届进博会入驻“能源低碳及环保技术”专区,展示公司在光伏新能源、电动汽车、贵金属循环利用、冶金等领域的材料和技术解决方案。

贺利氏在今年初就签约了第五届进博会。这是该企业连续第五届参展,表明其对进博会这一绝佳的展示、交流与合作平台的高度认可。从2018年首届进博会上36平方米的展位起步,贺利氏展位面积逐年扩大,展品数量不断增加。贺利氏大中华区总裁艾周平说:“感谢进博会搭建的平台创造了许多交流机会。我非常期待在第五届进博会上与各界人士继续深入沟通,争取达成更多战略合作。”

施耐德电气同样参展了过往每一届进博会。过去四届施耐德电气参展面积不断扩大,参展产品愈发先进,展示深度与广度不断升级。通过“进博效应”,施耐德电气的“朋友圈”也不断扩大。

“不少客户在第一届进博会上与我们签约后,逐渐发展成了一年一度相聚进博的老朋友。今年,我们的‘进博之约’还会继续,将聚焦‘数字化助力全产业链减碳’,展示一系列软硬件全覆盖的创新产品、解决方案和服务。”施耐德电气全球执行副总裁、中国区总裁尹正说:“进博会搭建了一个开放合作的重要平台。我们期待,在2022年进博会上进一步展现施耐德

电气在推动高效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领先优势和丰富经验,期待携手更多中国伙伴加快数字化和绿色低碳的双转型。”

过往每届进博会期间,乐高集团都会进行一系列新品的全球首发。借助进博会,乐高集团不仅将富有中国特色的产品及玩乐体验带给更多中国消费者,也让来自世界各地的消费者通过乐高产品了解中国文化。

乐高集团表示,今年进博会期间将继续带来新品首发,并开展一系列以玩乐为核心的特色活动。借助进博会带来的更多市场机遇和合作机会,乐高也将持续践行在华发展承诺,将更多高品质的创新玩乐产品与体验带给中国消费者。

自2019年首次参展进博会以来,波士顿科学参展规模连年递增,今年展台面积将扩大至首次参展时的3倍。此次,波士顿科学除了展示众多重磅“全球首款”,还计划携一系列本土化发展成果亮相,包括刚刚借助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成功获批并实现本土生产的血管内超声系统。

波士顿科学大中华区总裁张珺表示,公司正在积极筹备第五届进博会参展工作。2022年恰逢波士顿科学进入中国25周年,公司期待将全球视野的前沿技术和根植本土的创新成果带到进博会,借助“进博效应”,助力中国医疗健康事业发展。

除了众多“老朋友”,第五届进博会还将迎来不少“新朋友”。力拓、必和必拓、蒂森克虏伯、吉利德等世界500强都将首次参展。

必和必拓将以200平方米特装展台亮相第五届进博会,展示近年来其在碳减排领域的目标规划和研究成果。此外,必和必拓还计划在展会现场举办一系列合作签约仪式和绿色发展讲座。

“中国不仅是必和必拓全球最大的市场之一,也是必和必拓矿山机械、钢结构以及铁路货车等设备的重要供应国。”必和必拓中国区总裁王跃奎说,“在世界经济面临诸多挑战之际,必和必拓选择参展进博会,体现了我们进一步融入中国经济的决心和信心。绿色发展和低碳经济将重塑全球经济格局,我非常高兴必和必拓能有机会在第五届进博会期间与我们的中国贸易伙伴共同展示在这一领域的承诺和贡献。”

今年,蒂森克虏伯将在进博会上



上图、左图均为去年举办的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现场。(新华社发)



向全球展示其覆盖可再生资源、绿色氢能、钢铁、化工、水泥、交通等领域的绿色创新技术及应用案例,例如先进的碱水电解制氢技术以及转向系统、减振系统等智能驾驶解决方案。

蒂森克虏伯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

高岩表示,可持续发展是蒂森克虏伯的重要战略之一,蒂森克虏伯期待在进博会上展示集团多年来在绿色转型方面取得的卓越成果,并进一步加强本地合作,与客户及合作伙伴携手推动中国绿色发展进程。

日本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本报记者 陈益彤

8月1日,日本厚生劳动省中央最低工资审议会决定,将今年最低工资(时薪)平均上调31日元,达到961日元,上涨3.3%。

日本自民党干事长茂木敏充在8月2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对最低工资上调表示欢迎,称今后将通过对人才和尖端技术的大胆投资,继续提高工资标准。厚生劳动大臣后藤茂之则表示:“希望企业能切实提高工资,我们将提供支援。”

日本最低工资标准每年夏天由工人代表、雇主代表以及具有中立立场的公益委员组成的审议会讨论提出。以此为参考,各都道府县的审议会再决定具体金额,并从10月份左右开始实施。

今年受俄乌冲突、物价上涨、日元急剧贬值等因素影响,日本经济形势恶劣,给普通劳动者生活造成冲击,涨工资的呼声不断高涨。据日本媒体报道,在审议过程中,虽然劳资双方均认可提高工资的必要性,但是围绕工资上涨的具体幅度出现了意见分歧。对于劳方要求大幅上调工资的意见,资方以原材料价格上涨影响收益等为由,主张抑制工资涨幅。至7月25日,劳资双方代表和公益委员进行了4次协商,但均未达成共识。直到8月1日,经过7个小时的艰难谈判,各方才最终就涨幅标准达成一致。

分析认为,此次最低工资上涨实际效果有待检验,劳资双方均对这一结果表示不满。

一方面,此次最低工资上涨尚未达到解决实际问题的程度。日本经济界相关人士表示,虽然此次工资涨幅达到历史最高,然而如果剔除物价上涨部分,实际涨幅只有1%左右,对于解决劳动者生活困难杯水车薪。

此外,工资上调仅对部分收入偏低的劳动者工资有拉升效果,但对于工资处于更高水平的群体而言则收效甚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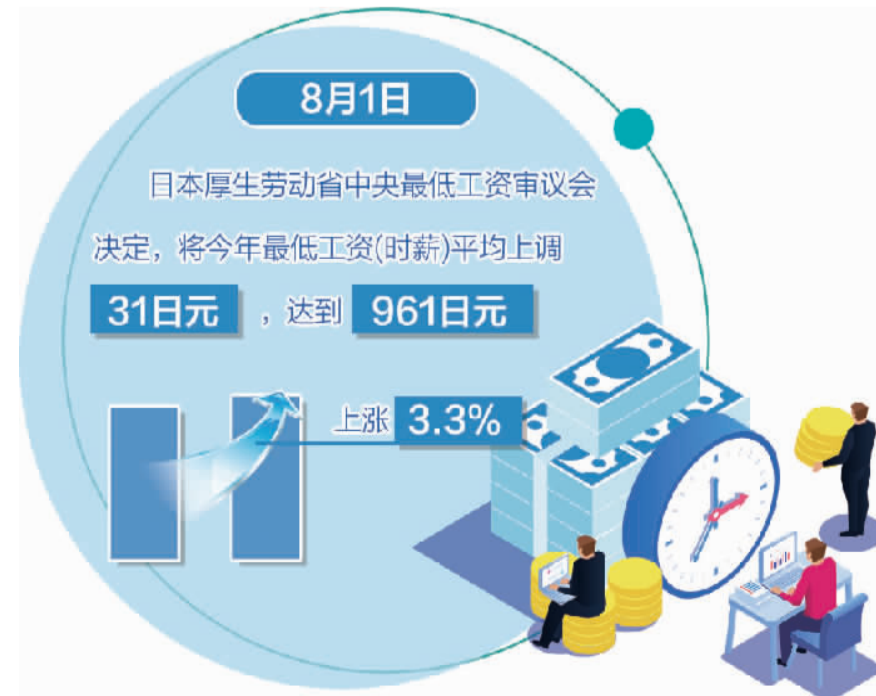
还有观点认为,仅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解决不了日本“同工不同酬”的问题。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的当下,大量企业通过雇佣非正式员工降低人工成本。在工厂同一条流水线上工作,正式员工工资可达非正式员工的2倍,这是造成日本最低工资水平低、贫富差距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何促进企业整体效益提升,切实实现按劳分配是下一步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

另一方面,最低工资上涨给企业造成负担。日本商工会议所会长三村明夫称,此次最低工资上涨“对企业来说非常困难”。他认为,这次提出的目标金额虽然考虑到了物价上涨对劳动者生活的影响,但并未充分考虑企业当前支付能力低下的现状。

分析认为,对于雇佣大量非正式员工的餐饮住宿企业来说,最低工资调整会造成总体成本大幅上涨,加之疫情形势严峻,企业经营状况不明朗,可能对其生存造成严重后果。

不仅如此,由于原材料价格高企,中小企业受成本提升影响更大,且存在难以推动成本充分传导至价格的情况。此时,若用工成本持续提升,将极大考验企业承压能力。如果企业放弃增加雇佣人数,或缩小业务规模甚至撤离,可能反而会带来失业和经济恶化的副作用。

企业界认为,日本政府不加大财政支出,仅靠政策要求强制企业提高工资水平是一种“政治提薪”的行为。经济同友会代表干事樱田谦悟对提高最低工资的计划表示赞成,但同时也指出,政府应拿出实际举措彻底改变企业生产力低迷的现状,强化日本经济竞争力。有观点认为,日本政府在提高工资标准的同时,应当考虑企业的实际运行情况,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并对提高生产效率和推进业态转型的中小企业进行全面支援,为企业自发提升工资创造条件。



本版编辑 韩叙美 编夏祎

中国行动紧密接轨非洲需求

单敏 王珩

7月下旬,中非智库论坛第十一届会议顺利召开,200多名中非各界人士聚焦双方发展合作问题积极建言献策,凝聚智慧共识。

当前,疫情反复频发,俄乌冲突未止,由此带来的全球粮食供应不足、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通胀率持续攀升、国际贸易滞缓等复杂性问题的延缓了非洲发展进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中国投融资在非洲的稳定发展。

联合国发布的《工业化对世界人民福祉的重要意义》报告显示,由于疫情对经济造成的持续影响,最不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增长近乎停滞,和已实现工业化的经济体相比,差距可能进一步拉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今年5月份发布的《区域展望》则显示,预计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2022年的经济增长率将从去年好于预期的4.5%放缓至3.8%,2023年经济增长率则为4%。

长期以来,国际社会以减贫为目标向非洲国家提供了大量援助资金,非洲经济也实现了连续多年的整体快速增长,但由于没有实现经济包容性增长,没有创造新的就业,非洲贫困人口不减反增,每3个非洲人中就有1个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若不采取有效措施,到2030年,全球约90%的赤贫人口将集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而过去40年里,中国7.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

人口70%以上,中国减贫经验可供非洲借鉴。围绕《中国和非洲联盟加强中非减贫合作纲要》,中非双方在基础设施、金融筹资、贸易往来、绿色开发等“惠民”领域展开减贫合作,积极推动非洲经济内生性和包容性增长,让减贫成果、发展成效惠及广大非洲人民。

发展是永恒主题,绿色发展是国际共识。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到非盟《2063年议程》,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到全球发展倡议,都将绿色发展作为经济复苏的关键增长点。据非盟统计,已有超过90%的非洲国家正式批准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客观上,非洲薄弱的工业化基础、脆弱的科技水平不足以支撑上述承诺的实现。对非洲而言,外部资金和科技力量的国际援助与合作尤为关键。中国在太阳能、风能、锂电池等清洁能源的研发与产值领跑世界。到2030年,中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中非能源发展结构互补性显著,合作空间巨大。双方合作对于总体处于工业化、城市化起步阶段的非洲注入绿色发展动能,开启非洲绿色低碳发展的新篇章,助力中非合作提质升级。

依靠科技创新和数字经济变革,助推合作模式迭代更新。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兴起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新

科技、新应用更迭加快,数字经济蓄势待发。中非投融资合作正在由传统的经济领域向新型基础设施、远程医疗、疫情防控等新兴产业加速延伸,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未来科技创新发展领域备受瞩目。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体系下,双方要优化政府政策对接,夯实数字化发展基础,搭建数字化发展平台,引导优质科创企业对接产业发展需求;加强清洁能源、非石油资源的技术合作与联合开发;着力推动农业技术创新与粮食安全,关注海洋经济开发与生态保护合作;提升医疗卫生体系建设与疫苗研发合作,全面构建中非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帮助非洲国家加速绿色低碳转型,实现中非在保护环境、发展经济、创造就业、消除贫困、公共卫生安全与救治等领域的共赢,增强中非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挖掘私营部门和民间资本力量,促进合作主体拓展升级。非洲发展主要依赖外部援助资金,非洲整体外部债务承压明显。当前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因素增多,资金避险属性突出,进一步恶化了非洲发展资金短缺的窘境。非洲开发银行7月初的数据显示,非洲国家今年需要4000多亿美元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破坏。中非共建“一带一路”,大量中国企业走进非洲。去年11月底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宣布,中国未来3年将推动企业对非洲投资总额不少于100亿美

元。目前有超过3500家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兴业,其中民营企业对非投资的数量和金额均超过70%。中非合作走实走深有赖于企业等私营部门的广泛深度参与,企业在创造商业价值的同时需兼顾社会效益,包括促进环境友好、改善社会慈善、深化产教融合、加强人文交流、推动国际商事调解等,把提升当地人民福祉作为合作发展的远大目标。

加强科技教育合作和知识分享,推动合作能力提质增效。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中,中国和非洲分别处于中上游端和下游末端。非洲的工业化进程有赖于技术水平和劳动力质量的整体升级。在全球发展鸿沟加剧的背景下,应进一步加强中非在技术转移与知识分享等方面的合作,对接非盟《2024科技创新战略》,通过中非科技伙伴计划、中非联合交流研究计划、中非高校20+20合作计划、中非智库10+10伙伴合作计划、鲁班工坊等现有合作平台,在中非之间形成共通共享的自主发展知识体系;创建校企联合研究中心,为中非实现成果转化、市场拓展搭建平台;提升非洲企业和中国大学、非洲大学与中国企业间的黏性,在教育和产业、劳动力市场之间建立紧密联系,促进人员培训、技术合作与转移,提升教育、科技在社会各层面的流动效率与影响力,助力非洲国家工业化水平提升,为其摆脱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末端劣势提供支持。

中国一直是非洲的真诚朋友。中非坚持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道路。中国行动需紧密接轨非洲需求,以更加主动的姿态,帮助非洲国家提升自主发展能力建设,努力推进双方合作的广度、深度和高度。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